

版本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

——以若干宋代典籍的比勘為例——

黃寬重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一、前 言

善本書一向是藏書家和版本、校勘學者所珍視的資料。歷史學者重視文獻材料，強調第一手史料，當然也注意書籍的版本問題，重視善本。以往在經、史、子諸部典籍上，由於許多學者投入校勘、補遺的工作，成效卓越，史學研究者利用既有成果，就能順利進行研究，減少許多謬誤。近年來，研究領域擴大，取材超乎上述諸部，及於文集、方志等典籍，然而，這類史料為數雖多，却鮮有精深的校勘。因此，在版本的差異可能造成不同的結論的情形下，忽視版本的重要性——慎選版本——勢必影響研究成果。

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時期。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及文化昌盛，留下許多當代知識份子的記錄，其中包括文集、地方志等，對宋史研究的重要性實不亞於正史資料。因此，這類典籍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。但是，書籍經過多次傳抄或翻刻後，容易造成內容脫漏或改易的現象。此外，宋人強調尊王攘夷，重視夷夏之防，宋朝又常受強鄰遼、金、蒙古的侵凌，朝臣在討論時局，凡涉及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時，常顯現強烈的民族意識。到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後，基於政治考慮，在編纂或

抄錄這一時期的文獻時，對涉及民族意識的文詞，乃擅加竄改、抽燬。不論無意的改易或脫漏及有意的竄改、抽燬，對歷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。因此，比較不同的版本對歷史研究極有意義。

版本、校勘是一門專精的學問，非受專業訓練及淵博的學識、深厚的功力，難以有成。筆者於這兩項專門學問俱屬外行，只是於探討宋代史事時，經常利用文集，稍留心版本問題，發現不同版本的文章，若干文字、語詞出入極大，若不加以甄別，會增加研究的困難，乃於研究之餘，從事補輯史料，兼比勘不同版本之典籍，加以整理，條舉若干實例，分類說明，以提醒歷史研究者於利用典籍時，留意版本問題，善用精校善本。

二、現有研究成果簡介

宋代傳世的典籍數量頗多，是研究宋代歷史的重要憑藉，學者爲了減少因版本歧異影響研究成效，增加典籍的可用度，逐漸重視這種文獻甄別、校勘和補遺的工作。由中國大陸官方所推動的古籍點校計劃，透過羣體的合作或個人的努力，利用不同版本加以比勘、校對、標點，不僅達成文化普及的作用，也便利學者的研究。由於長期的努力，獲致卓越的成效，除了正史和古代經典外，許多筆記小說以至文集，都經過點校者廣泛蒐集不同版本，細心校勘、標點後刊出。以最近大陸出版的二種典籍爲例，可以顯示出善本書籍對歷史研究的重要。一是『名公書判清明集』，這部書是研究宋代法制，特別是南宋後期社會史、經濟史和法制史的重要史料，向爲史學界所重視，日本學者用力尤勤，但以往只有刊行日本靜嘉堂所藏的宋殘本。民國七十一年，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曾瑜、陳智超、吳泰三位先生，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十卷的明刻本，後來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足本十四卷的明刊本。十四卷本的內容約爲宋殘本的四倍，經點校後於七十六年一月正式出版。這部書的整理、出版，對南宋晚期的歷史研究有極大的貢獻¹。二是增訂本『陳亮集』，陳亮是南宋孝宗朝的著名學者，他的著作在死後編輯並刊刻成四十卷本的文集和四卷的外集，不過到明中葉已不易覓得完本；成化間永康人朱潤、汪海以殘缺的龍川文集和外集合併改編成三十卷本，刊行於世。數年前鄧廣銘教授利用中

1 參見陳智超：「宋史研究的珍貴史料——明刻本『名公書判清明集』介紹」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：『名公書判清明集』（中華書局出版，1987年1月初版）·下冊附錄七，頁645-686。

央圖書館所藏宋刊『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』的影本與成化本比對，乃以成化本為底本，增收『二先生文粹』中「策問」三卷、「漢論」五卷、「任子宮觀牒試之弊」、「人法」二文，『永樂大典』殘卷中「代妻父祭弟茂恭」、「代妻祭弟何少嘉」二文，而刪除元人所作「後杜應氏家譜序」一篇，並加以校訂、標點，於七十六年八月出版了增訂本的『陳亮集』²。對研究陳亮思想的學者極有助益。

臺灣的學術界雖然在古籍的「點校」工作乏尚可陳，但在學界與出版界合作下，影印出版了不少珍善典籍，以供學者比較研究。重視版本與校勘的專家更一再強調版本對研究的重要。如昌彼得教授的「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舊抄本攻媿先生文集」（『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』第十六期）、「跋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」（『故宮季刊』十卷一期）、「宋槧南軒先生文集跋」（『故宮季刊』十六卷二期），及李學智教授的「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」（『圖書館學刊』一期）等都是顯例。此外，鄭騫教授在「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的原本與刪節本」（『中央圖書館館刊』新一卷二期）文中，以四部叢刊本所收朱熹『八朝名臣言行錄』與文海出版社影印李衡、李幼武刪節的『宋名臣言行錄』相對照，列舉若干實例，說明刪節本的缺失。王德毅教授於編輯『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』時，以『長編』、『要錄』、『會編』等十餘種宋代文獻與『輯稿』比對，找出『宋會要輯稿』一千一百餘處錯誤，乃寫成「宋會要輯稿校勘記」（『史原』第八期）。喬衍琯教授在「崇文總目輯本勘異」一文（『故宮學術季刊』四卷四期），利用錢侗輯釋本與四庫全書本詳加校勘，發現四庫本優於流行的錢氏輯釋本。最近，旅美學人陳學霖教授在「范成大攬轡錄傳本探索」文中（『國史釋論』下冊），更舉出『攬轡錄』若干不同節本並加以比較。而梁庚堯教授於「劉燾雲莊集的版本及其真偽」文中（『書目季刊』八卷三期），則將『雲莊集』中所收劉燾文章與真德秀相同者，加以考訂，是辨別文獻真偽的一例。這些利用不同版本，所進行的比對、校勘、辨偽的工作，對宋史研究貢獻極大。

除上述版本校勘以外，輯佚的工作，對充實典籍內容，豐富研究資源更具意義。臺灣的學者重視專題研究，雖也有若干學者孜孜於輯佚工作，獲致一些成果，但就整體成績而言則遠遜於大陸學者。大陸學者經常在點校的典籍之後，以附錄的形式，呈現他們輯佚的成果。以宋代的文集而言，值得特別提出的有三種：一是孔

2 鄧廣銘：「陳龍川文集版本考」，收入陳亮著、鄧廣銘點校：『陳亮集』（增訂本，中華書局出版，1987年8月初版）上冊頁1-27。參見鄧廣銘：「三十卷本『陳龍川文集』補闕訂誤發覆」，『歷史研究』1984年二期，頁35-49。

凡禮先生在傅璇琮先生蒐集的基礎上，從『永樂大典』、『黃氏日抄』、『歷代名臣奏議』、『宋會要輯稿』等書中輯出范成大的文論凡一百三十五篇、詩九首、詞八首，殘篇若干，合成『范成大佚著輯存』一書（1983年），對研究范成大與南宋中期歷史，很有助益。二是孔凡禮先生自明抄本『詩淵』及『永樂大典』等書中，輯出宋末元初詩人汪元量的詩一百首，詞二十三首，刊行『增訂山類稿』（1984年），有助於研究汪元量的詩及晚宋的歷史。三是樂貴明先生從現存『永樂大典』中輯出數十種四庫全書本所失收的文章達一千八百六十四條，成爲『四庫輯本別集拾遺』（1983年）二冊，更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資料，其中吳泳的『鶴林集』一書，四庫全書本自『永樂大典』中輯出六十四條，樂先生所輯達四百六十四條，比四庫本多出四百條，特別值得重視。

三、若干南宋文集校勘、補遺舉隅

筆者自民國六十三年春，探討「程秘與洛水集」專題時，開始注意版本問題，並以不同版本的『洛水集』進行比勘，草成「四庫全書本得失的檢討——以程秘的洛水集爲例」（『漢學研究』二卷一期）一文。同時，對四庫全書本『洛水集』失收的文章予以增補，草成「四庫全書本洛水集補遺」（『書目季刊』八卷三期）。此後，每於探討南宋史事時，留心不同版本所呈現的問題。茲以筆者進行比勘的文集：胡銓的『胡澹庵先生文集』、李曾伯的『可齋雜稿』、周必大的『文忠集』及上述『洛水集』，加以整理，分別就校勘、補遺二項，名舉若干例證，說明版本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，以就教於方家。

（一）校勘舉隅

1. 涉及民族意識的文字竄改。宋人民族意識強烈，在撰作文字時，對不斷侵凌宋朝的遼、夏、金、蒙等外族，每多批評，甚或詆毀，這些文字，對滿清朝廷自是一大忌諱，因此，在修纂四庫全書時，對凡涉及夷狄的文字都擅加更改，這包括二類：

(1) 詞的改動：這種現象非常多，甚至有改錯的情形，謹舉十八例加以說明：

(A) 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朱熹神道碑」：「乞戒茶馬司互市毋溢額，仍勿於坤維禁山內伐木造舟」（頁14下）。「坤維」二字，『永樂大典』（以下簡稱『大典』）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夷漢」。

(B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七「禦邊五事」：「況此備南非備北也」(35頁下)，明成化本『歷代名臣奏議』(下簡稱『奏議』)卷三三八與舊鈔本『可齋雜稿』(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，此本為四庫本之底本)卷一七均作「備變非備也」。

(C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五「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」：「惟時井絡接壤，要荒彼方，虎視以窺秦」(頁21下)，「要荒彼方」舊鈔本作「裔夷鞏方」。

(D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八「出師經理襄樊奏」：「或來此而先據之」(頁25上)，「或來」舊鈔本作「賊闖」。

(E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二〇「回丞相邊事公劄」：「近世邊外用兵，如敵之下諸國」(頁18)下，「邊下」舊鈔本作「夷狄」，「敵」舊鈔本作「鞏」。

(F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二二「代錢蜀閩赴召」：「直用精神定遠陬」(頁7上)，「定遠陬」舊鈔本作「斃老酋」。

(G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二八「送趙鼎臣赴召」：「邊防豈特固藩籬」(頁16上)，「固藩籬」舊鈔本作「慮戎狄」。

(H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五「繳印經略書遣官往安南奏」：「往安南覘探近事」(頁19上)，「近」舊鈔本作「鞏」。

(I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五「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南事」：「近日之事，亦因陳氏」(頁25上)，「事」舊鈔本作「寇」。

(J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六「回奏宣諭」：「收之附黨則有名」(頁43下)，「黨」舊鈔本作「賊」。

(K)四庫本『澹菴集』卷二「上孝宗封事」：「今北寇橫行」(頁7上)，「北寇」乾隆三十二卷本(刊本)作「醜虜」(卷八，頁3下)。

(L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一四「回雀侍郎」：「萬一此時竄身無地」(頁16下)，「此時」二種明刊本(指明嘉靖二十七卷本及崇禎三十卷本)均作「此胡」。

(M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一四「回雀侍郎」：「百姓所恃以為司命，邊人所望以為叛服者」(頁18下)，「邊人」二種明刊本均作「羗酋」。

(N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二「甲申上殿劄子」：「又況山東諸郡，夏焚之，金棄之，中國亦置之度外矣」(頁18下)，「夏」字二種明刊本均作「鞏」，指蒙古，非西夏。

(O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一一「朱惠州行狀」：「金人相攻，山東歸附」(頁11上)，「金人」二種明刊本均作「金鞏」，指女真與蒙古，「金人」二字實誤。

(P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三四「寧宗皇帝輓詩」：「聖德同天運，神功並日昇，邊庭懷慄慄」（頁3上），「邊庭」二種明刊本均作「韃眞」，指蒙古、女眞。

(Q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一五「賀江東運使」：「竊以天開興運，月屬佳辰」（頁1上），「佳辰」二種明刊本均作「亡胡」。

(R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前』卷一「賀襄樊告捷」：「猶傾厦之莫支，執訊以還，盡空壁而亟遁」（頁11上），「傾厦」舊鈔本作「禽獮」，「空壁」作「獸奔」。

(2)文句的改動：茲舉十一例。

(A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三二「沁園春」：「敵淮頭水向咽流，誰把烏橋付石尤，問只今人物豈無安石」（頁8上），舊鈔本作「淮頭虜尚虔劉，誰爲把中原一戰收，問只今人物豈無安石」。

(B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前』卷一「賀襄樊告捷」：「虜虎之闕，逐鹿而來」（頁11上），舊鈔本作「狼貪弗章，承突而來」。

(C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前』卷五「重修靜江府城記」：「四年，敵始攻蜀，自是烽火交於中國」（頁10下），舊鈔本作「四年，韃始闖蜀，自是獸蹄通於中國」。

(D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六「回宣諭奏」：「臣靖思敵在大理亦已五年，深謀窺伺，熟我蹊路」（頁3上），舊鈔本作「臣靖思賊在大理亦已五年，徂伺鼠窺，熟我蹊路」。

(E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一〇「記十五夜星犯月」：「適驗天心，悔禍亟彼哉蠶食」（頁34上），舊鈔本作「適驗天心，厭胡羯此胡蠶食」。

(F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一二「桂闈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」：「遠人啓爨非山變也」（頁31上），舊鈔本作「獸夷犯順非小變也」。

(G)四庫本『澹菴集』卷二「辭免宗正少卿乞賜罷黜狀」：「任六押於七旬，方敵騎橫肆之時，爲我國生靈之患」（頁12上），乾隆三十二卷本作「任六押於七旬，方犬羊抵轍之時，肆蛇豕薦食之毒」。

(H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五「禦戎」：「而維彼強敵，干迷天紀，兵氛燭於機槍，怒氣昏于河洛」（頁15上），二種明刊本作「而蠢彼鞑鞞，干迷天紀，妖焰燭於機槍，腥氣昏于河洛」。

(I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一三「上執政書」二：「興定以後，國勢稍減於前，今也天亡，蒙古乘之，盡族南遷，消弭無日矣」（頁3上），二種明刊本作「由古狄強未有久於是者，今也天亡，韃鞬乘之，毀巢南竄，殲滅無日矣」。

(J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二三「奉送季清赴山東幕府」：「手勒不賜弓矢旅，長

城偶倚雍公虛，邇來聞敵尚窺窳」（頁8下），二種明刊本作「單于臺下雖寬誅，采石山前已斷顛，邇來殘虜尚窺窳」，四庫本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二一六則將「殘虜」改成「殘敵」，餘均與明刊本同。

(k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二五「用邱樞密韻」：「午夜金陵膽斗極，百年梁汴望刀頭」（頁2上），二種明刊本作「午夜金陵膽斗極，千年胡昂滅旄頭」，四庫本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二一六作「午夜金陵膽斗極，千年玄昂滅旄頭」。

2. 一般文字的改易：

(1)人名，有六例：

(A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壇適文林郎漢州州學教授闕阜……增適承議郎充雲安軍使兼知縣事張仲」（頁22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壇適……教授任阜，……增適……兼知縣事張伸」。

(B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七「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狀」：「判官廳公事孫膚」（19頁上），『奏議』卷一五〇作「判官廳公事沈孫膚」。

(C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二〇「回奏邊民習射指揮」：「昔种世衡守青澗城」（頁1上），舊鈔本作「昔神世衡」。

(D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前』卷三「乞休致奏」：「臣珙牧荆，臣玠鎮蜀」（頁12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三四九五作「臣珙牧荆，臣介鎮蜀」。

(E)四庫本及崇禎本『洛水集』卷五「人才」：「皇帝諸臣如風后、力牧、伶倫、岐伯之儔」（頁33上），「皇」字明嘉靖刊本作「黃」。

(F)四庫本及崇禎本『洛水集』卷七「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」：「宗正趙氏名師貢……丞名范，蓋端明殿學士諱方之子」（頁2下—3上），明嘉靖本作「宗正名師貢……丞趙氏名范，蓋端明殿學士諱方之子」。

(2)官名，有三例：

(A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又宰相以蜀人帥蜀，工部並除二侍武臣提點刑獄，皆違舊制」（13頁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工部並除二侍郎，武臣提點刑獄，皆違舊制」。

(B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二「謝臣寮上言降一官」（頁13上），舊鈔本作「謝臣僚上言降一二」。

(C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六「回奏宣諭」：「此荆淮諸間軍到支犒」（頁36上），舊鈔本作「此荆淮諸間軍到支犒」。

(3)年代，有二例：

(A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十七「上禦邊五事」：「嘉靖年間」（頁36上），『奏議』卷三三八作「嘉定年間」是。

(B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前』卷五「重建湘軍樓記」：「寶祐戊午」（頁12下），舊鈔本作「宣祐戊午」誤。

(4)地名（國名），有五例：

(A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知榮州，州因山爲城」（頁10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榮州」，按宋代無榮州，榮州在北宋屬梓州路。

(B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古城國入貢」（頁11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占城國入貢」是。

(C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七「上禦邊五事」：「左江則駐永平，右江則駐橫山，蓋此二處，人皆知爲今日控扼校理，防備幹腹之要地」（頁37上），『奏議』卷三三八作「今日控扼校理，防備幹腹之要地」是，「校理」指陵趾、大理。

(D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七「上禦邊五事」：「團結右江唐與歸等州一十八隘」（頁9上），『奏議』卷三三八作「唐興、歸樂等州」，按二州在今廣西百色附近。

(E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九「回夷遞宣諭」：「至象州境合柳江」（頁27上）舊鈔本作「家州」誤。

(5)數字，有六例：

(A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六世祖瑜，始復屬籍，仕至長江令，公長江令六孫」（頁8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六世孫瑜，始復屬籍，仕至長江令，公長江十一世孫」，按王德毅師『李燾父子年譜』所列世系與『大典』同。

(B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公遂進圖初至治平二百八卷」（頁12上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」，按燾在「進長編表」中亦作「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年，計一百八卷」。

(C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，「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，散九百八十卷，一覽難周，別爲舉要六十八卷，總目五卷，修撰事目六十卷」（18下—19上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總目五卷，修換事目十卷」，按：『文獻通考』卷一九三引李燾言「共修換事總爲目一十卷」。

(D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五「再辭免狀」：「其增入共百餘萬緡」（頁7上），舊鈔本作「共有餘萬緡」。

(E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五「淮西總乞投閒狀」：「諸屯不下五十萬石」（11上），舊鈔本作「不下十萬石」。

(F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二二「勉子姪」：「唯有黃卷書，可以解我顏」（頁2下），二種明刊本均作「唯有萬卷書」。

(6)文字、事務，共有十例：

(A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庶幾兩得。照垂拱上壽止樂正殿，爲此使權用」（頁11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詔垂拱……爲北使權用」。

(B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先是直入秘書正字，……遷校書著作文字同典史事，摺紳榮之」（頁17上、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父子同典史事」。

(C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八「荆閩回奏四事」：「往來與金爲鄰，恐邊置場之利」（頁5上），『奏議』卷三三八作「往年與金爲鄰，沿邊置場之利」。

(D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八「荆閩回奏四事」：「此外諸城多臣寓治」（頁7上），『奏議』卷三三八與舊鈔本均作「多在寓治」。

(E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前』卷三「四乞休致奏」：「無歲敵不入，而乃事多掣肘」（頁15上），『大典』卷一三四九五作「無歲虜不入，而事多禦時」。

(F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五「癸未知貢舉經義場」：「使首不軒，尾不輕」（頁3上），明嘉靖本與四庫本，崇禎本將「輕」作「輕」字。

(G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一六「建康鹿鳴宴」：「腹中自有百萬甲，筆陣獨掃千人軍」（頁2上），「陣」字，崇禎本作「障」。

(H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一〇「呂君尹之墓誌銘」：「故君教子尤力，卒伸父志，非孝之忠乎」（頁9上），崇禎本與四庫本同，「忠」字，嘉靖本作「終」字是。

(I)四庫本『洛水集』卷七「行在重建都督府記」：「直嫁聘以恤孤，保封田以衍餉」（頁11下），「封」字，崇禎本與四庫本同，嘉靖本作「葑」是。

(J)四庫本『澹菴集』卷四「二友堂記」：「於是視廬之偏得古松」（頁6下），乾隆三十二卷本卷一七及『大典』卷七二三八均作「於硯廬之偏得古松」。

(7)脫漏、衍字，有七例：

(A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李由他道去。仕張氏子競家貲」（頁10上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仕族張仕子競家貲」。

(B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公節用度，停燕，官府肅然」（頁18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停燕集，官府肅然」。

(C)四庫本『文忠集』卷六六「李燾神道碑」：「人頗懷安，公爲上前日紛紛，今日默默」（21頁下），『大典』卷一〇四二一作「公爲上言」。

(D)四庫本『可齋雜稿』卷一七「師廣條陳五事奏」：「向來謝濟之往，前帥之，實奉朝命」（頁33上），『奏議』卷三三八作「前帥遣之」。

(E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後』卷一〇「庚申病中作」：「符到卽去庸何傷」（頁34上），舊鈔本作「符到卽去庸何傷，珍重諸公，各宜自愛」。

(F)四庫本『可齋續稿前』卷三「乞休致奏」：「自知無能，於世用矣奚益」（頁12上），『大典』卷一三四九五作「於世用奚益」。

(G)四庫本『澹菴集』卷四「二友堂記」：「將大用，會告饑而廬陵特甚」（頁6下），乾隆三十二卷本卷一七及『大典』卷七二三八均作「會南方告饑而廬陵特甚」。

3. 一般文句的改易，有二例：

(1)四庫本『澹菴集』卷四「二友堂記」：「夫能牧養小民，惠鮮鰥寡，必剛毅不同之士，蓋剛則不奪於慾，故曰棖也，慾焉得剛，而書則曰：剛而無虐，惟無虐爲無慾，惟不慾可以言剛」（頁6下—7上），乾隆三十二卷本卷一七作「夫能牧養小物，惠鮮鰥寡，其惟剛毅不同之士，然剛難不失之虐則奪於慾，故曰棖也，慾焉得剛，而書曰剛而無虐，蓋不虐不慾可以言剛」；『大典』卷七二三八於「小民」、「必剛毅」、「而書則曰」三處與四庫本同，餘均與乾隆本同。

(2)四庫本『澹菴集』卷四「二友堂記」：「所謂九萬則風斯在下矣，是故可友而不可屈，雖然公將羽儀天朝，固不能屈之使卑，卓然特立，臨大節而不可奪」（頁7下），乾隆三十二卷本卷一七作「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是固可友而不屈，公將羽儀天朝，固不能屈之使西如摩頂者，然能卓然特立，臨大節而不可奪」，『大典』卷七二三八則「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矣，雖然是固可友而不可屈，公將羽儀天朝，固不能屈之使西如摩頂者，然能卓然特立，臨大節而不可奪」。

(二) 補遺舉隅

1. 四庫全書本關於涉及民族意識文字之抽燬：清廷在修纂四庫全書時，曾頒布「違礙書籍條款」，以爲修纂之準則，其中第六條規定：「凡宋人之於遼、金、元、明人之於元，其書內凡記載事蹟有用敵國之詞，語句乖戾者，俱應酌量改正，

如有議論偏謬尤甚者，仍行簽出擬銷」³。在這一規定下，四庫館臣對僅在文字上牽涉到夷狄等處擅加竄改，已如上文所述，而對整篇斥責夷狄，具強烈民族意識的文字，則予以抽燬，這種情形，昌彼得教授在「跋國中央圖館藏舊鈔本攻媿先生文集」文中，曾舉出四庫本『攻媿集』、『鷄肋篇』、『莊僖文集』等抽燬事實。其實，顧炎武的『日知錄』在清刊本中，也有將原抄本中「素夷狄行乎夷狄」及「胡服」二條抽燬的事例⁴，筆者所發現的有二條，都是從四庫全書的底本中找出的，一是程秘所著『洛水集』卷五「試閣職」第一部分，原文凡五九四字，明嘉靖刊二十七卷本及崇禎刊三十卷本都有上述文字。二是李曾伯『可齋雜稿』卷二三「招諭北人通事榜文」，全文凡五七六字，見於舊鈔本卷二三，頁5上一6下。四庫本全數抽燬。

2. 文獻缺漏與補遺：不同版本除了文字歧異外，也有篇目多寡之別，甚至有漏收的情刊，因此，補遺、輯佚是充實內容的重要工作。筆者在「四庫全書本洛水集補遺」一文中，就列舉四庫本失收文集內容三十五條（其中一條即上述涉及民族意識被抽燬者）、程秘生平事蹟十九條。後來亦發現廣雅本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』二處嚴重缺漏：一在卷一〇六頁一下第八行註文起至頁二下第九行正文止，原文大致重錄卷二一頁三五上至下有關苗、劉叛變的文句，錯簡的現象非常明顯，光緒五年仁壽蕭氏校刊本、史學叢書本、國學基本叢書本均與廣雅本同，只有四庫全書本才是正確的。二是卷一八六頁六下第七行，原文有「以下原缺」的字樣。這個缺漏，也只有四庫全書本是完整的，從四庫本頁十上至頁三一下，前後有二十二頁的資料是廣雅本所沒有的。近年來，筆者在校勘『澹菴集』及『可齋雜稿』時，也從『大典』等文獻找到不少可以作為輯佚的資料，謹列述如下：

關於李曾伯所著『可齋雜稿』，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舊鈔本為四庫底本，除上述涉及民族意識的一篇文字被抽燬者外，篇目均與四庫本同，筆者所補者共五條：一是『大典』卷二八一「通制置啓」（頁2下），二是『大典』卷一四九一二「代謝丞相啓」（頁8下），三是四庫本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二八二「題宜興菴壁二首」（頁5下一6上），按『可齋雜稿續稿後』卷十頁5下，有此題之詩，亦五言，惟內容不同。四是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二八二「遊千山觀·有序」（頁6下一7上），五是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二八二「善權奇觀」（頁7上）。

3 王重民輯：『辦理四庫全書檔案』（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，民國23年初版）「乾隆43年」，頁60下。

4 參見原抄本顧亭林『日知錄』（文史哲出版社，台北，民國68年8月），「日知錄校記」，頁970，983-985。

胡銓所著『澹菴集』，存世的有二種本子，一是三十二卷本，有乾隆二十二年重刊本（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），道光癸巳年再刊本（補入四篇文字，漢華文化公司影印刊行，民國五九年七月）；一是六卷本，有朱墨合校之舊鈔本，藏於中央圖書館，四庫全書本亦屬六卷本，二種刊本所收篇目出入極大，筆者擬專文討論。在二種刊本之外，筆者於『大典』、『兩宋名賢小集』、『奏議』等書共輯得胡銓著作共四十九條，限於篇幅，僅舉十條為例：

- (1)「東池卽事」，見『大典』卷一〇五六，頁24下。
- (2)「與陳長卿劄」，見『大典』卷三一四八，頁19上、下。
- (3)「陳大夫墓誌銘」（陳皓），見『大典』卷三一四九，頁8下—11上。
- (4)「送王嘉叟侍郎使虜，仍用其韻」，見『大典』卷一〇八七七，頁6上。
- (5)「上洪師李伯紀丞相」，見『大典』卷一五一三八，頁5上。
- (6)「題永興觀」，見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一七七，頁6上、下。
- (7)「寶氣亭」，見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一七七，頁6下。
- (8)「携具賞石渠醑醑用坡韻呈同舍」，見『兩宋名賢小集』卷一七七，頁7上。
- (9)「上孝宗奏狀」，見『歷代名臣奏議』卷四九，頁3下—7上。
- (10)「淳熙間奏狀」，見『歷代名臣奏議』卷四九，頁7上—8上。

四、結 語

從上述介紹研究成果及列舉校勘、補遺的實例，當可使學者更加體認版本對研究歷史的影響，進而肯定善本書籍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，就宋代的典籍、文獻而言，雖然不斷有人從事校勘、輯佚的基礎工作，也獲致豐碩成果，但是宋代典籍數量極多，版本歧異，目前的工作只是起步而已，實有待更多學者投入這項學術奠基的工作，或在研究時就所發現的版本問題，提出討論，以免重蹈覆轍，並增進研究成效。此外，四庫全書本的優劣得失，學者有不同意見，但由於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，尚難有被各方所接受的想法。如今，四庫全書已影印出版，利用者漸多，亦宜有更多的人經由仔細校勘以評定其得失，以及多方面的蒐集遺漏資料，充實典籍內容，以便利學者研究時參考、資取。

（本文係出席民國7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漢學研究中心舉辦之「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」論文）